

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价值观问题研究

王 鉴¹, 宋 燕²

(1.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2.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我国不同时期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及教材均反映相应的价值取向。本文依据价值观内容的相关指标,以我国五套较有影响的大学英语教材为分析对象,客观地呈现大学英语教材选文背后的价值取向及其演进特点。大学英语教材价值观从语言工具的价值取向发展成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价值取向。随着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政策的落实,大学英语教材价值取向又呈现出多元价值并存中选择主流核心价值观的特点。对大学英语教材价值取向的比较分析,为进一步编写和修订我国大学英语教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的重新编写势在必行。

[关键词] 大学英语; 大学英语教材;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23)05-0010-09

教材是国家事权,教材编写的价值观问题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教材所承载的价值观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我国大学英语教材随着时代的发展,形成了多种版本,教材所承载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那么,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到底承载了什么样的价值观? 语言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又是如何在教材中得以体现并演进的? 这些价值观又是如何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影响大学生的行为方式和文化认同的?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应在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中引起高度重视。从目前来看,关于大学英语教材价值取向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只能零星地看到有些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例如,郑晓红以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为例,分析了教材选文中文化价值取向的具体呈现方式与特征^①;彭爱武在对各个高职院校英语教材所设置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要求加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其中所传递出的价值取向^②;张虹和于睿分别选取当前新出版且使用范围较广的四套大学英语教材各自的第一册,通过文本内容的比较分析,揭示出它们对于中华文化相关内容的具体呈现方式^③;徐锦芬则基于“课程思政”内涵,探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素材中的思政内容建设^④。总之,当前关于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价值观方面的研究,既不能纵向梳理大学英语教材价值观的呈现与演进,又不能横向分析价值观的表现形式,尤其是针对国内不同时期不同版本大学英语教材的对比分析较少。鉴于此,本研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四个时期的五套大学英语教材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大学英语教材中所蕴含的取向不同的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的具体建议,促使大学英语教学更好地为新时代大学生的语言素养提升服务。

一、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关于价值观的要求分析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制定实施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是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和教学的主要依

[收稿日期] 2023-0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度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VGA170001)。

[作者简介] 王鉴,男,杭州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宋燕,女,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① 郑晓红:《论文化价值取向在大学英语教材中的呈现——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全新版)为例》,《外语界》2009 年第 2 期,第 86—91 页。

② 彭爱武:《高职院校英语教材价值取向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8 年。

③ 张虹、于睿:《大学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研究》,《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0 年第 3 期,第 42—48、91 页。

④ 徐锦芬:《高校英语课程教学素材的思政内容建设研究》,《外语界》2021 年第 2 期,第 18—24 页。

据。改革开放之初,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三个版本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1979年,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起草《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四年制试用)(草案)》,于1980年8月出版。该大纲提出公共英语的教学目的是“为学生阅读英语科技书籍打下较扎实的语言基础”,使他们“具备阅读有关专业的英语书刊的能力”,有助于“引进、学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初,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文件中,大学英语教学是将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而对待,教学的目的主要在于为大学生能够充分学习、吸收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验,培养应有的语言能力,以更好地助力于国家经济建设,而并未关注到语言背后所承载的价值观问题。1985年11月,教育部成立了大学英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并分别于同年和次年先后颁布《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理工科本科用)》和《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文理科本科用)》两个教学大纲,其中明确指出,英语教学的目的主要在于能够使得学生“以英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打下较好的基础”。这里虽然对英语学科的工具性和应用性以及不同门类的学科英语各自的侧重点进行了区分,但依然未提及大学英语教材的价值取向问题。1999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提倡大学英语教学应有助于学生“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提高文化素养,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将文化素养的提升,纳入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所需人才的培养要求之中,但也只是简单提及,而没有给出具体的培养方案。

进入21世纪以来,教育部加大了对大学英语教学的规范与指导,先后出台大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要求。2004年1月,教育部印发《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其中首次明确将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国际视野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而提出。教育行政部门开始关注到语言工具性功能之外的价值性属性,特别是英语语言与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之间的内在联系,也逐渐考虑到大学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和了解世界文化的桥梁所具有的可行性。2007年,教育部高教司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正式版,进一步指出“大学英语课程要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应“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对于大学英语教学的强调重点,从单纯的工具性上升到工具性与人文性兼备的高度,显然该文件已经认识到大学英语教育“不仅仅是将语言作为知识或是‘实体’来教授,它同样具备跨文化教育、素质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的价值”^①。2015年,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试行版)将大学英语的课程性质界定为“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明确指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培养学生的世界眼光和国际意识”作为英语教材编写与教学应有的价值观。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的精神,顺应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又对《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5版)》进行了修订,形成了2020版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在大学英语课程性质的定位方面,明确提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要求,强调课程在塑造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性的同时,要求“将课程思政理念和内容有机融入课程”,“应在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大学英语教材只注重语言工具性价值的倾向,增加了中华文化的回应性思想,既可能通过大学英语的学习,了解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又可以通过掌握英语工具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介绍弘扬到海外,从而形成大学英语价值观的双向传承与交流,即大学英语教材既是输入国外先进文化的重要渠道,又是回应和输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通过对不同版本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随着课程改革的发展,教育行政与管理部门对大学英语教材功能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规定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正在逐渐加强对价值认知和文化输出等方面的功能,改变了传统的只注重语言知识与能力的价值取向。这种转变所体现的不但是教育界,更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对于英语教育性质的认知所发生的变化。在当下的普遍认知中,英语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能够作为一种渠道,有助于当代大学生对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获得更透彻也更深入的理解。无论是提升国家自身的文化软实力,还是开展“文化外交”,以促进和维护国家文化利益的推广和传播,英语都是一种极佳的助力工具。因此,在大力发展英语语言技能培养的同时,更要注重和加强对中华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以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促进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从而维护国

^① 沈骑:《新中国外语教育规划70年:范式变迁与战略转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68—77页。

家利益^①。这不仅是新时代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应有的价值取向,更是当前大学英语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价值取向。

二、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价值取向的比较分析

(一)我国大学英语教材演进及价值取向问题

大学英语是对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而开设的,最初被称为“公共英语”,1986年后改称“大学英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所使用的教材都有所不同^{②③}。发轫于1961—1966年期间的第一代大学英语教材,以1961年董亚芬主编的《理科英语》和《文科英语》为代表,通常采取以语法为纲、以课文注释和分析为主的模式,着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以静态和线性的单一方式进行文本的叙述和编排。在这一时期,国家并未颁布任何专门指导大学公共英语教学的政策性文件,教育部于1964年10月所制订的首部外语教育纲要《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中,也并未对大学英语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提出要求^④。

第二代大学英语教材产生于1979—1985年期间,基本上仍遵循传统模式,以课文为中心、以语法为纲要,但在教材结构上有所突破,更加注重英语学习的基本规律和系统性,强调听、说、读、写、译的基本功训练,同样以培养学生具备初步阅读英语科技书刊的能力为教学目标。这一时期的代表教材主要有复旦大学的《英语》(文科用)、北京大学的《英语》(理科用)。虽然1980年8月颁布的《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四年制试用)(草案)》中,依然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观方面的培养要求,但相关教材的选文中还是体现出鲜明的价值观取向,如《英语》(北京大学版)第一册课本第55页 *We Help Each Other*,第95页 *A Picture of Our Laboratory*,第105页 *An Announcement*,第115页 *Serve the People*,127页 *A Letter from a Factory* 等课文内容均体现出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进入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的第三代。这一时期的教材开始按大纲要求进行编写,并分为“阅读、写作、听说、语法练习册、词汇练习册”等五个系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6所高校合编的《大学英语》和清华大学编写的《新英语教程》。清华大学编写的《新英语教程》相关的选文中,则部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集体主义、人性本善的价值取向,有个别选文,如第三册第99页课文 *Family Values in America*,甚至介绍了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先后出现了《大学英语》《新编大学英语》《21世纪大学英语》等第四代大学英语教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董亚芬主编的《大学英语》,“按分级教学的要求编写,各编六册,每级一册”,并分为“精读、泛读、快速阅读、听力、语法与练习”等五个系列,这套教材被公认为国内第一部立体化的大学英语教材。在随后的1999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中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当帮助学生“提高文化素养”,但这种要求仍未上升到价值观要求的层面上。只有到了21世纪初,根据修订版大纲再版的《大学英语》(精读)教材,由于选文大部分来自西方国家,如第一册第44页 *The Young and the Old*,第二册第126页 *There's Only Luck* 以及第139页 *Who Saw Murder Didn't Call the Police* 等文章,才明确体现了西方个人主义及人性本恶的价值取向。当然,这虽然有助于学生了解西方文化,提高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文化素养,但也使得有关集体主义取向的选文被大幅缩减。

进入21世纪后,又出现了许多时代性鲜明的第五代大学英语教材,这些教材伴随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而诞生,主要有《新视野大学英语》《大学体验英语》《新时代交互英语》《大学英语(全新版)》《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等,打破了原来一套教材一统天下的格局,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多媒体化的趋势。它们通常会附上视频光盘,还会提供自主学习课堂、网络资源平台、数字化教学平台等线上学习渠道,并进一步提升和强化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多项语言技能的操练要求,由此所建立起的立体化教学模式也比以往更加完善和成熟。与此同时,2007年7月教育部印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明确提出大学

① 曹迪:《新中国70年英语教育政策文本的国家利益观分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2期,第9—17页。

② 董亚芬:《大学英语教学的回顾与展望》,《外语界》1992年第3期,第23—26页。

③ 李荫华:《继承、借鉴与创新——关于〈大学英语〉系列教材(全新版)的编写》,《外语界》2001年第5期,第2—8、57页。

④ 文秋芳、常小玲:《中国共产党百年外语教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1年第2期,第7—19、89页。

英语教学要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并将“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作为教学的核心目标。虽然同时强调大学英语课程要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但仍未明确提出课程的价值取向要求。2008年再版的《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二版),根据最新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将跨文化交际知识融入其中,所选课文中描述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信息,为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提供了有效途径。如《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二册第2页的课文 *Time-Conscious Americans*,着重介绍美国人的时间价值取向;第三册第77页课文 *Culture Differences in Western and Japanese Decision-Making* 讲述日本人与西方人在进行决策时的方式差异;第三册第88页课文 *Five Famous Symbols of American Culture*,则对美国文化的五大象征,即对自由女神像、芭比娃娃、美国哥特人、野牛镍币和山姆大叔中所蕴含的与美国文化紧密相关的历史、故事和风土人情进行了描述。这些课文展现了不同文化中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并将跨文化交际的相关知识融入其中,对提高学生这一方面的交际能力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正如刘可红与吴华指出的,这套教材的选文具有明显的美国文化与价值倾向,并在教材中被反复强化,极易被中国学生接受而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准则,从而在他们思想中引发强烈的价值冲突,甚至可能会导致原有的本土价值观被挤压乃至消退的结局^①。

随着大学英语教材的多元化发展,大学英语教材所承载的价值观问题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2017年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并在教育部下设教材局,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把教材作为国家事权来管理。大学英语教材是我国高等教育普遍使用的教材,用量极大,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重视和加强大学英语教材价值观问题,对于推进大学英语思政课建设和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有着双重意义。大学英语教材在语言学习和文化继承方面要严格把关,将语言学习与文化价值观传承有机统一起来,同时通过跨文化交际、文化回应教材编写、中华文化外输等途径,在大学英语教材中加强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双向输入与输出功能。

(二)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价值取向比较分析

价值观是一种外显的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的观念标准,也是个人或群体所具有的一种意识特征,影响人们对自身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②。为了能更好地研究并且测量价值观,许多学者将探究对象具体到文化价值取向这一层次。“价值取向”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克拉克洪(Kluckhohn)和斯托特贝克(Strodtbeck)提出的。这个概念虽然有点复杂,但是其自身也有着确定的模式规则。它有助于解决一些人人需要面对的普遍问题,并且对于人类的思想意识和认识活动具有指导作用^③。克拉克洪和斯托特贝克认为,文化价值取向就是指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由于各自受到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和指导,而对人类普遍面对的问题给予答案、看法、态度和评价时,所持有的不同标准^④。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用人的本性取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时间取向、活动取向以及人际关系取向这五个价值取向维度,对特定文化影响下人们的价值观进行衡量。每种取向都有三个不同的变量^⑤,具体的维度分类如表1所示。

表1 克拉克洪和斯托特贝克价值取向维度

价值取向(Orientation)	变化(Postulated Range of Variations)		
人的本性取向(human nature)	恶(Evil)	善恶并存(Mixture)	善(Good)
人与自然关系取向(man-nature)	屈从(Subjugation)	和谐(Harmony)	掌控(Mastery)
时间取向(time)	过去(Past)	现在(Present)	将来(Future)
活动取向(activity)	存在(Being)	成为(Becoming)	做(Doing)
人际关系取向(relational)	等级/专治(Lineality)	集体主义(Collaterality)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资料来源: F. R. Kluckhohn & F. L. Strodtbeck, "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Chicago, IL: Row & Peterson, 1961, pp. 12.

① 刘可红、吴华:《外语教育的文化取向研究——评〈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美国化文化取向》,《现代大学教育》2005年第4期,第99—102。

② William H. Swatos, Jr. Editor,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Society", <http://hirr.hartsem.edu/ency/Values.htm>.

③ 郭爱丽、翁立平、顾力行:《国外跨文化价值观理论发展评述》,《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34—43。

④ Kluckhohn & Kelly, "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R. Linton (Ed.), "The Science of Man in the World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pp. 78-105.

⑤ F. R. Kluckhohn & F. L. Strodtbeck, "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Chicago, IL: Row & Peterson, 1961, pp. 10-11.

本研究选取改革开放以来最能体现不同时代特色的五套大学英语教材:杜秉正主编《英语》(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刘平梅主编《新英语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董亚芬主编《大学英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郑树棠主编《新视野大学英语》(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李荫华主编《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这些教材都是各个时期所出现的最具有代表性、发行量较大,且使用范围较广的教材,每套教材的出版时间间隔都在十年左右,能够清晰反映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发展的历时脉络。并以克拉克洪和斯托特贝克的五种价值取向维度作为教材选文内容中价值观的测量工具,以语篇作为价值观取向分析的编码单位,从每套教材的1至4册课文中找出涉及表1中各种价值取向维度的内容进行编码,分别计算每种价值取向在整套教材中所出现的数量以及所占的比例,以此来揭示教材选文内容呈现出的主要价值观,进而梳理出五套教材各自的主导价值取向,然后加以对比分析。通过统计分析,每种价值取向在五套教材中的呈现特征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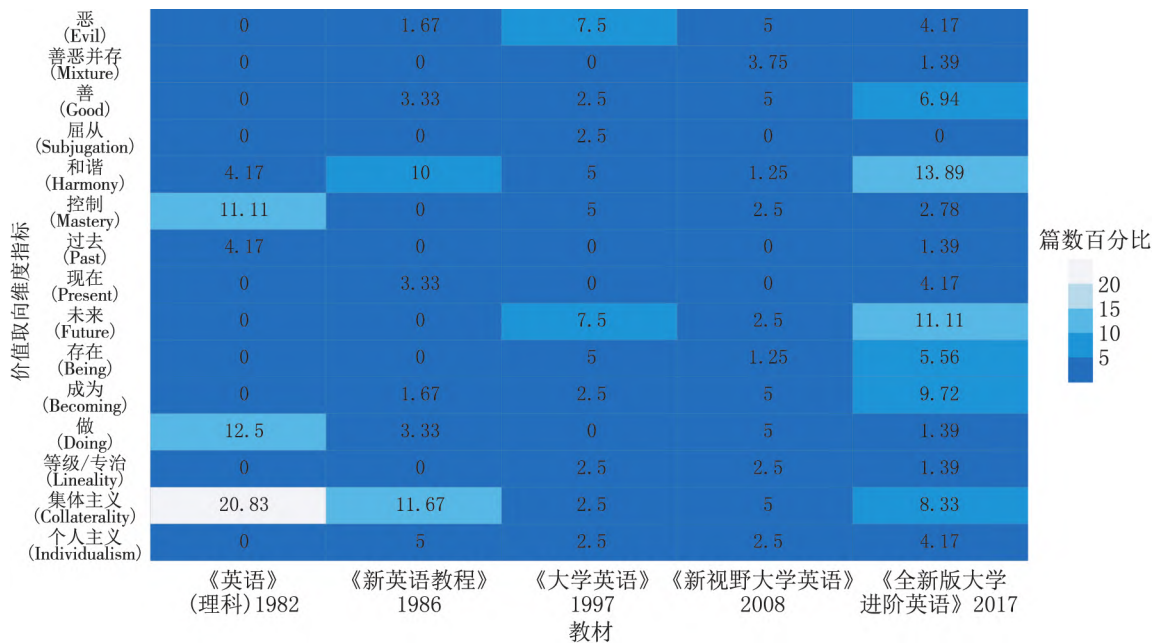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价值取向在不同大学英语教材中呈现的特征

北京大学出版的《英语》(理科)1—4册共计72篇课文,其中反映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课文达15篇,占比20.83%,超过选文的五分之一,体现了鲜明的价值取向;相比之下,表现人类控制自然这个主题的选文有8篇,占比11.11%;而以强调活动本身“做”为主题的选文有9篇,占比12.5%。这一阶段教材并没有体现人性善恶和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选文出现,而主要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科学至上、为人民和国家建设服务以及促进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等价值观作为课文选择的标准。

清华大学出版的《新英语教程》1—4册共计60篇课文,其中反映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课文7篇,占比11.67%,位列最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个维度的选文有6篇,占比10%;以人之本性善恶与否为取向的选文各占3.33%和1.67%;同时还出现了个人主义取向的选文3篇,占比5%。相较之前,体现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选文缩减一半,但与之前北京大学版的《英语》相比,表现出多学科、多主题、多文化的特点,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和丰富。

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学英语》1—4册共计40篇主课文中,反映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课文仅有1篇,占比2.5%,同时还出现了体现等级/专治以及个人主义取向的文章各1篇,各占2.5%。这套教材中体现人性本恶与未来时间这两种价值取向的选文最多,各3篇,占比7.5%,之后依次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控制自然,以及活动中的“存在”维度,均有2篇,占5%。体现集体主义取向的选文继续大幅缩减,更加注重对于西方文化的介绍,出现了一些体现个人主义及人性本恶的价值取向的选文,教材选文所涵盖的价值取向维度总体上更加丰富。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的《新视野大学英语》1—4册共计80篇课文,其中反映人性善恶、活动取向中的“做”和“成为”还有集体主义取向的文章各4篇,占比5%,以人之本性善恶并存在为取向的选文占3.75%,而体现控制自然、等级/专治、个人主义取向的选文各占2.5%。这套教材中,各个价值取向的呈现都较为均衡,且覆盖面广,集体主义取向的选文也相较之前有所增加,占比轻微上升。选文内容主

题,总体上以社会文化类占绝对优势,话题非常丰富多样,出现了多元价值取向的鲜明特点。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1—4 册共计 72 篇课文,其中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类主题和价值取向的选文最多,4 册内容中均有涉及,有 10 篇文章,占比 13.89%。这一价值取向恰好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相吻合。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八大以来所提倡的“五位一体”的重要内容,倡导尽最大可能维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应当体现在当代大学英语教材选文中。以强调“未来”为主的时间取向维度的选文占比次之,有 8 篇,占 11.11%。活动取向维度中的“成为”的选文有 7 篇,占 9.72%。体现集体主义取向的次之,共有 6 篇,占 8.33%,体现人性本善的选文占比 6.94%,体现个人主义和人性本恶取向的各 3 篇,占 4.17%。以人类控制自然、善恶并存以及强调过去维度为取向的文章只占很小的比例,分别为 2.78%和 1.39%。

(三)中国大学英语教材价值取向的演变特征

通过对五套教材选文价值取向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征。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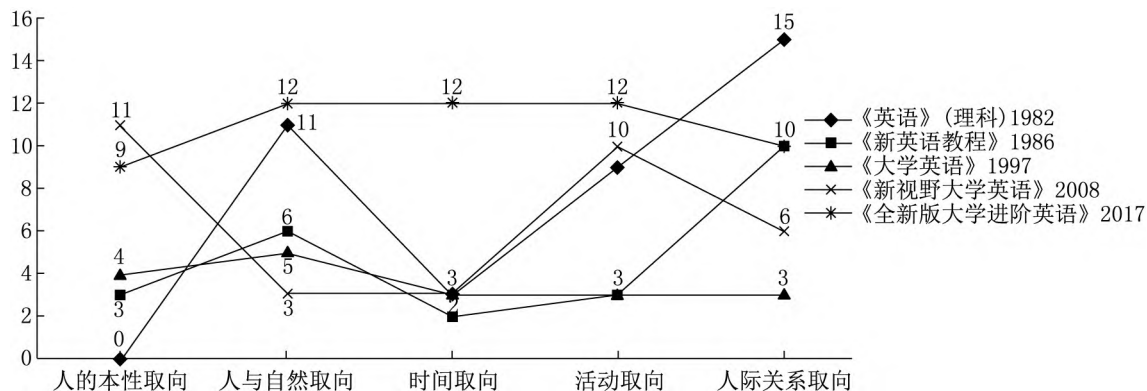


图2 五套教材选文价值取向对比分析

首先,体现集体主义取向的选文占比,总体呈现 V 形曲线。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大纲对教材的价值取向未做任何要求,但同期教材如 1982 年《英语》选文中则呈现出鲜明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占比高达 20.8%。之后呈递减趋势,至 1986 年《新英语教程》中降为 11.7%,在 1997 年《大学英语》最少,仅有 1 篇,占比仅为 2.5%。之后又逐渐增加,直至 2008 年《新视野大学英语》中体现这种取向的选文出现了 4 篇,占比增至 5%,到 2017 年《全新大学进阶英语》中增加为 6 篇,占比上升至 8.3%。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课程导向及教材选文内容均经历了巨大变迁,这显然与我国的政治环境、教育思想和外语政策等方面的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开放初期的教材选文主要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科学至上、为人民和国家建设服务以及促进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体现集体主义取向的选文也最多。世纪之交,中国加入 WTO,加速与国际接轨,这一时期教材选文也出现明显的“西化”趋势,绝大多数选文来自欧美国家,以英美为主,选文内容以社会人文类占绝对优势,虽然话题丰富多样,但在表现出多元价值取向的同时,有关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选文却被忽视,占比大幅下降。直至 21 世纪以来,在国家大力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背景下,随着相关教育政策及文件的出台,反映中华文化与集体主义取向的教材选文才逐年增多。

其次,教材选文中逐渐呈现出多元的价值取向。英语教材通过语言传承的主要是与它相关的文化与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多与西方文化有关。这也是我国大学生学习西方优秀文化的一种渠道,自然无可厚非,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大学生的“三观”有明显的影响。如何在学习借鉴西方文化中优秀内容的同时,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体现在大学英语教材之中?大学英语教材从一开始的编写中就有意识地体现了这一点,这样就形成了大学英语教材选文的多元价值取向。不同的是,不同时代强调的重点有所差异。这种多元的价值观同时还体现在文本内容之中,有些文章中会同时出现两种以上的价值取向,有时不同价值取向在同一篇文章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三册第 77 页的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Western and Japanese Decision-Making* 一文,讲述的是日本人与西方人进行决策时的方式差异,文章对跨文化交际中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取向的价值观进行了描述和比较。文中还描述了日本文化的几种重要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决策者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以何种具体方式,发挥了何种具体影响。例如,在日本任何谈判或处理问题的过程中,都体现着“你对你(you

to you)”)的互动关系,会尽量考虑社交圈中对方成员的感受和立场,不主张率性而为并轻易发生冲突,而主张只有个人融入并依靠集体,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有别于西方“我对你(I to you)”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在这种取向中,双方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说出自己想要什么,或者希望得到什么,强调的往往是自我和个人的需求和成就,对于群体以及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较弱。

1982年《英语》中的选文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仅涵盖五大维度总共15种具体价值取向中的5种,占比三分之一;直到后期的教材中,选文的价值取向才逐渐丰富;2008年《新视野大学英语》的选文,所涵盖的价值取向维度则多达13种,至2017年《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进一步达到14种,几乎涵盖所有价值取向维度。近年来,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更加注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价值观的不同,大学英语教材及教学正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及其价值观,这也是当前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所要求体现的特征。

再次,大学英语教材越来越注重体现中国文化元素与核心价值观。前四套教材的选文大多来自欧美国家,侧重于体现目标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取向,尤其是《新视野大学英语》,全套读写教程的80篇文章中,来自美国的选文高达50篇,占比62.5%,表现出明显的美国化倾向。通过对这五套教材的分析可以发现,大学英语教材选文所体现的主要是内圈文化,即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①,也更加重视学生语言基本功的操练和英美文化方面的学习^②,却忽视了将中国文化有机融入教材的选文和任务设计,对于学生准确理解本土价值观以及跨语言表达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更是教学过程中的薄弱环节,由此造成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③。

在所选五套教材中,目前使用范围较广的是2017年出版的《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这套教材“每册书均有一个单元专门谈及中国话题”,“每册书的每个单元均有一篇与主题相关的有关中国的文章”,在《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所选的共计72篇文章中,涉及“中国元素”的选文有22篇,占31%,将近三分之一,这些选文均体现出明显的中华文化价值观,与以前那些主要体现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的同类教材明显不同。并且在这套教材中,同一主题单元中的选文往往采用中西对比的视角,这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中西文化的了解,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思辨能力。

总之,现行使用的大学英语教材中,对于中国文化元素的关注度有所增加,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向,但总体还是偏少。现行的英语教材中理应进一步增加与这种主题相关的选文篇目,至少应该与体现西方文化的篇目相当,才能防止大学英语教材成为纯粹介绍西方文化的载体。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大学英语教学成为增强大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重要渠道,并进一步为中国文化注入更为丰富的现代内涵。另外,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差异巨大,通过不同的选文内容就可以构成二者之间的鲜明对比,这不仅有助于学生获得开阔的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学习和了解西方的文化,更有助于中外文化之间的跨边界交际与融合。

三、关于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与修订的建议

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的选文取向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最初是自在价值观的选文取向,即只注重“文”而没有重视其价值,承载的是西方的价值观。当意识到选文价值取向的重要性之后,价值取向直接指向集体主义以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大学英语教材选文开始注重多元文化的价值取向,试图调适中西文化,找到共同的价值取向。21世纪以来,国家加强对大学英语教材选文价值取向问题的重视,2017年《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教材的价值取向开始在五个维度中寻找平衡,形成了多元的价值取向,这一历程从图3中显得更为直观。

随着教材作为国家事权政策的落实,大学英语统编教材势在必行。新时代大学英语统编教材应调动全国一流的相关专业人员,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新定位大学英语教材的性质,在教材选文价值取向方面不仅要平衡五个方面的价值取向,而且要在价值取向上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优秀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选文的重要依据,让大学英语教材成为高等院校立德树人的重要渠道。具体来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教材的编写或修订工作。

① Tomlinson B. & H. Masuhara, “The Complete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2017.

② 张蓓、马兰:《关于大学英语教材的文化内容的调查研究》,《外语界》2004年第4期,第60—66页。

③ 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光明日报》2000年10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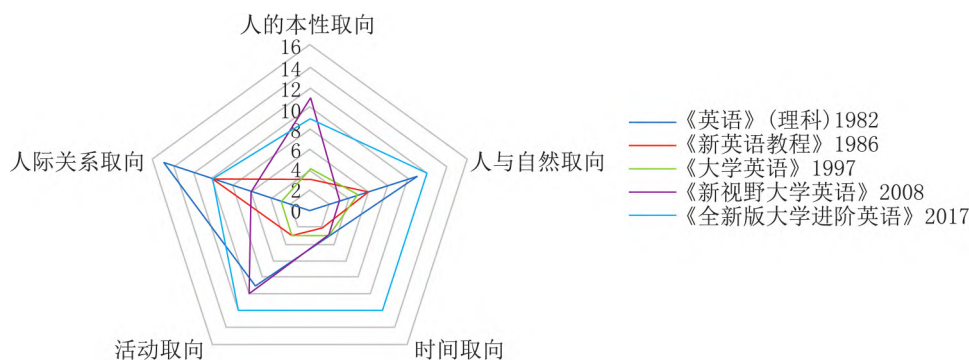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版本教材五种价值取向选文平衡比较分析

(一) 大学英语教材选文要突出时代性与生活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①一切价值准则、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只有放在一定的生活背景中,付诸特定的生活实践中,才能够被学生理解和认同。可以说,现实生活是大学生价值取向构建的出发点和归宿。大学英语教材选文应与当前国内外社会现实生活紧密相联,关注国际国内热点问题,让语言的学习与时势的掌握融为一体,把握时代的脉搏。大学英语教材的选文应与当代大学生的生活紧密相联,体现大学生学习的特点,关注大学生的生活经验,有效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有效融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促使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与修订能够及时跟上时代步伐,及时贴近当代大学生的生活需求,使大学英语教学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大学生语言素养的提升。

(二) 大学英语教材选文应体现国内外优秀文化的传承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是将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使用,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使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在多元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必然会碰到多元价值观及其冲突问题。大学英语教材选文在呈现多元价值取向的同时,应教会大学生尊重异文化与价值,弘扬中华文化与价值,真正做到在跨文化交流中对异文化的学习及中华文化的输出。大学英语教材通过语言学习引领大学生进入异文化领域,进入他者的意义世界,允许大学生经历他者自我认同的价值,从中发现一些在自身的传统中被排斥的、被淹没的、被边缘化的或者甚至根本视而不见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大学英语教材要树立国家事权的意识,引领大学生通过语言的学习而开展文化与价值观的对话,培养年轻一代大学生的精神气象,以“文化中国”为精神复兴的内容,既要成为自己精神的内核,又要通过语言、文明、价值观的对话而让其走向世界。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中的选文大多来自英语国家的小说、新闻、报刊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应则明显不足,很容易形成大学生的中华文化失语症。所以,大学英语教材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价值观进教材的力度。

根据最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中对课程性质的界定,大学英语课程要“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能力”,“服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现行使用的大学英语教材中,所体现的本土文化元素和内容的占比确实偏低,应适当增加与中国历史文化、科技成果、社会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关的内容。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引入一些蕴含中国元素的英文纪录片文本、中国典籍英译选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社会变迁史的英文推介等资源作为教材的选文。在培育学生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同时,稳步提升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阐释力和传播力,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大学英语教材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在新版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与修订过程中加强中国元素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选文;另一方面,在大学英语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思政”加强大学生语言学习中的价值观教育。前者为后者提供文本与内容,后者为前者创造经验与案例,这两方面的工作应同时推进。

(三) 大学英语教材要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2020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要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也明确指出大学英语要在“课程建设、教

^①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材编写、教学实施等各个环节充分挖掘其思想和情感资源,丰富其人文内涵,实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同时要求“大学英语教学应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使之在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现有的大学英语教材难以充分满足新的教学要求与目标,教材选文没有形成以育人目标为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难以形成语言知识传授、语言能力培养、人文素养提升与价值观塑造的合力。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关键要素,一个是教师,另一个是教材。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推动和引导教师提高自身思政意识、增强思政教学能力、落实思政课堂效果的抓手和基石。因此,大学英语教材建设应落实课程思政要求,在选文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为例,教材选文以不同主题为单元(Theme-based),每个单元有一个明确的思政主题统领课文、视听说内容与教学活动、练习设计、最后的产出性任务与项目。每册教材要突出相对的思政维度与内容,整套教材要体现思政理念与积极的价值取向。应使得思政内容尽量契合并融入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境,进而被他们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在促进他们英语语言技能提升的同时,更能保证他们形成牢固的价值取向,从而成为对国家、制度和文化都充满认同和信心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总之,大学英语教材选文的价值取向,体现国家意志,事关国家事权,是选择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据,也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与《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均指出,教材编写应当适应新时代的新需求,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反映本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更应当在凸显学科特色的同时突出创新性,以更好地服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大学英语教材建设是高校学科专业建设、教学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因此,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视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是当代大学英语教材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新时代大学英语教材亟须加强对中华文化的呈现和传播,并兼顾母语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如此才能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于本土文化的优秀内容和价值观进行英语表达的能力,以及对世界多元文化进行有效理解、分析和鉴别的能力,使得他们成为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文化品格的时代新人,成为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和互动的代言人。

Research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s Reflected in College English Textbooks in China

WANG Jian¹, SONG Yan²

(1.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2.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value orientations reflected in College English syllabuses and textbooks in different stages in China are differential. Based on the 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of Kluckhohn and Strodtbeck, this paper selected five sets of influential College English textbook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objectively demonstrates the value orientations and developmental features behind the selection of College English textbooks.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value orientations behind College English textbooks choice have evolved from English only being a linguistic tool to the unity of instrumentalism and humanism in College English.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that teaching materials are the embodiment of national will, the values embedded in College English textbooks are also characterized by the prevailing of mainstream core values from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value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s behind College English textbooks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to further compile and revise College English textbooks in China which is imperative.

Key words: College English; College English Textbooks; Value Orientations

[责任编辑:何宏俭]